

抗战时期农业教育委员会与大后方农业教育研究

罗 玲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农业教育委员会,作为发展农业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也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规划指导农业教育的重要部门。为适应战时体制与长期抗战需要,农业教育委员会对国统区农业教育作了统筹规划与部署。虽然国民政府农业教育委员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具有明显的官方立场,带有实用性、功利性和不彻底性,但其在推动战时中国农业教育、促进农业学术研究、推广农业知识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全面考察和研究战时农业教育委员会及大后方农业教育的相关史实,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对当今农业发展与“新农科”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农业教育委员会;大后方;农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1-0059-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106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其教育部也随之迁渝。1938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农业教育委员会(下文将之简称“农教会”,笔者注),统筹规划指导其时全国农业教育。在国难时局下,国民政府当局试图通过对农业学科的规划与管理,把农业教育与农业的推广普及、农业增产与整个国家发展相结合,以达到抗日救亡的目的。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农业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高等农业教育史,代表性成果如周邦任、费旭主编的《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1]、杨士谋的《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略》^[2]、包平的《二十世纪中国农业教育变迁研究》^[3]、李瑛主编的《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4]。这些著述资料翔实,对民国时期高等农业院校的专业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科研与农业推广体系、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此外,各农业高等院校出版校史中也记载了一些宝贵的史料,如:《南京农业大学史(1902—2004)》《华中农业大学校史(1898—1998)》《四川农业大学史稿(1906—1990)》《河南农业大学校史(九十年华诞)》《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等。这些校史以相关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为主线,对各校办学历史作了回顾,多以教学、研究、推广三方面为主要内容。然而,作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规划指导发展农业教育的重要行政机构,国民政府农业教育委员会却鲜少被关注。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档案文献史料的梳理,勾勒相关史实,衔接“农教会”的各个环节,剖析其成立、改组、发展的整个概况,以及在动荡的国难时局中,其为推广普及农业教育,发挥“农业救国”功能所做的努力。

收稿日期:2025-01-20

作者简介:罗玲,女,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抗日战争史与教育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研究”(20BZS077)。

一、农业教育为发展农业的基础：国民政府农业教育委员会的成立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政界与农学界逐渐认识到农业对复兴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意义。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将增加农业生产列为长期抗战的重要国策之一。革新发展农业教育成为其时国民政府当局与农业界尤为迫切的呼声。

当此非常时期,诚欲改进此国家盛衰所系之农业问题,则政府亟应召集全国农学专家,会商确定战时农业方案,以便切实推行,而陶铸全国农业技术人员,农业教育之调整问题,即为其重要工作之一,尤宜切实改进,而不容忽视者也。^[5]

农业教育是农业之母,有好的农业教育才有好的农业。战时农业必须与平时农业相互推进,才能有恃而无恐。^[6]

于战时能建立农业教育的基础,也可以说就是为平时的农业撒下优良的种子,农业技术人员是抗战建国的基干人才。^[6]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于1938年制订《战时各级教育方案》,规定农工并重的原则,“过去学制大部抄袭自欧美工商业国者,于农业部门缺乏全盘之计划,今国家虽从农业而入于工业建设之途,大多数人民,固犹在农业社会中度其生活,故宜兼顾不可或偏”^{[7]31}。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5月修正《农业教育委员会章程》,正式成立“农教会”,作为规范与指导战时全国农业教育的机构,设委员9至15人。其中,常务委员3至5人,秘书1人,处理日常事务^[8]。同年8月,国民政府“农教会”举行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议决改进中国农业教育纲领、调查登记农业专门人员、调整各级农业学校课程及拟定课程标准、调整高等农业机关研究工作、拟定建教合作方法及计划等事务^[9]。随后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顾毓琇、陈礼江、钱天鹤、谢家声、邹树文、章之汶、曾济宽、曾省、周建侯、张丕介、熊伯衡、赵连芳、吴俊升、钟道赞、顾树森、谭熙鸿、唐志才、安事农、陈植、吴研因、戴应观、贾成章等委员出席^[10]。1942年成立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如下表所列。

表1 1942年国民政府农业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11]1284}

职务	姓名	到任时间	备注
常务委员	顾树森	1938年5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
	钱天鹤	1938年5月	国民政府经济部农业司长、农林部次长
	邹树文	1938年5月	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
	曾济宽	1938年5月	专任
	张丕介	1938年5月	专任
	熊伯衡	1938年5月	代张介驻会办公
	周建侯	1939年9月	专任
	钟道赞	1941年10月	简任督学
秘书	钟道赞	1938年5月	

据新修正的《农业教育委员会章程》,再次明确“农教会”职责,即规划各级农业教育方案,拟定各级大学或独立农学院、各级农业专科学校、职业学校课标及设备标准,筹议地方教建合作及农业推广事业,建议农业教育兴革事项^[12]。整体上看,《农业教育委员会章程》对“农教会”运作纲领与原则、运作模式、职能权限、委员构成、开会周期以及经费管理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规定,体现了“农教会”的行政机构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出了设置“农教会”的深层目的,即发展农业学校教育,推广农业知识,促进农

业增产增收的社会功能。“农教会”委员多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国民政府农林部、其时各农学院负责人或农业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或重要成员,他们均为近代我国农业教育体制和农业科技体制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农教会”的诸多提议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重视和采纳,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体制的建设与完善,为近代我国各级农业院校布局与农业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农业救国:国民政府农业教育委员会的各项举措

作为战时农业教育的指导机构,“农教会”致力于推进各级农业教育,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与发展大后方各级农业教育,如健全农业教育行政组织,规划与部署各级农业学校的设置与招生规模,规范各级学校农业教学,统一课程标准,出版发行农业教材等。这些举措促进了抗战时期农业教育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一) 拟定各级农业学校办学标准

“农教会”成立伊始,便着力于修订改进其时农业教育发展纲领、规范其时农业院校教学标准。1938年8月2日,“农教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我国农业教育改进纲领》,修正了《大学农学院分系及课程标准草案》《各大学农学院及农业专科学校之研究工作方案》《大学、农学院分系及课程标准》《高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教学科目及时数案》《高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课程设备标准》《中学教科书应增加农业教材案》《小学教科书及教材特别注意农业案》^[10]。此外,“农教会”制订了各级农业学校办学标准,在设备方面,拟定《大学农学院及专科学校实习场所设备标准》《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最低设备标准》;在建教合作方面,订定《农业建教合作实施方案》《农林技术机关与农林教育机关联系与合作办法大纲》《农林建教合作初步实施办法大纲》;在农业生产方面,订定《中等以上学校员生助耕助收实施办法》《调用各级农业学校学生从事粮食生产工作办法》《各级学校实施农业生产办法大纲》《国立中学举办合作农场办法》《国立中学及师范学校农业生产实施计划》;在农业教育计划方面,拟定《农业教育推进计划大纲》^[13]。上述方案的颁布,不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 统一课程标准与各类农业教材

“农教会”先后拟定《大学农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大学农学院分系必修科目表》,将国文、外国文、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农学概论或农艺经济及农业经济学、农场实习9科列为大学农学院共同必修科。1938年,“农教会”订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分农艺、园艺、蚕桑、森林、畜牧、农产制造等科,暨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各科教学科目及授课时数表、课程标准^{[14]28}。1940年,“农教会”先后公布《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各科课程标准》41种。到1942年,公布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课程58种,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各项科目标准已全部公布。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农教会”的意见,颁布《农业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将农业专科学校各农科的名字统称为农艺科、森林科、畜牧兽医科、农业经济科、农产制造科、蚕丝科、农业工程科7科,并规定各科必修与选修课程表^{[1]175}。此外,为增进全国各级学校学生营养与生产技能,“农教会”于1940年拟定《各级学校实施农业生产办法大纲》,通令全国学校实施农业生产。规定各大中小学每周应有3小时农事生产工作^{[15]183}。“农教会”的以上措施,规范统一了各级农业学校教学内容与教学体系,优化了课程结构,课程体系趋向标准化、综合化,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农业教育理念。

为促进各大学农学院、农业职业学校教科书的编辑,“农教会”筹设大学农书编辑委员会、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设各科共同组、农艺组、畜牧组、森林组、蚕桑组、水产组、农业经济及农产制造组等9组编写教材。到抗战结束,农业技术教材已编竣30余种^[16]。此外,“农教会”还邀请重要农业院校编辑中等农业职业学校教材。如194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应邀编辑《农村合作》《农业经济学》《农场经营》《果树园艺》《蔬菜园艺》《花卉园艺》《造园学》《观赏树木》《园艺品利用》《普通园艺学》多

种职业学校教材^[17]。这些教材切合我国农村与农业实际,相当一部分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各级农业学校教材与参考书。这不仅为其时农业教材建设做出了贡献,也提高了教学质量,为近代农业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调整与规划各级农业学校

国民政府“农教会”成立后,一方面增设农业院校以及专修科,一方面调整设置农学相关专业。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其时的西北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设六个系科与农业推广部。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其时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以造就高初级农业学校教员为目的”,改设农业教育系。在其时的私立复旦大学增设垦殖专修科。并令私立大厦大学教育学院“以造就农业及工业职业学校教员为主旨”^{[18]340}。1939年,在“农教会”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其时陕、甘、宁、青、川、康、云、贵等省创办农工学院办法,规定各职业学校由农工学院辅导。1940年上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增设改组“福建省立农学院”“国立贵州农业学院”;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湖北省农业专科学校”改办为农学院,福建省、湖南省各增设农业专科学校1所。在其时四川增设私立川康农工学院、铭贤农工专科学校^{[19]189}。在乐山设“国立中央技术专科学校”,办农业经济、畜牧犬医等专业^[20]。“农教会”在部署农业院校及调整专业时,尤为注重教育资源的集中与整合,农业院校的系科总体上得到充实,促进了其时“四川大学”农学院和“西北农学院”等内地农业院校的发展,创造了适应战争需要的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取得了联合校办学的宝贵经验,使农业推广更加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大力培养农业师资

为推进战时西南各省农业教育、培养农业师资,“农教会”多次办理各种农业职校教员暑期讲习会。1938年,“农教会”在重庆开办第三届农业职业学校教员暑期讲习会,召集其时川、滇、黔三省公私立农业职业学校校长及主任教员赴会学习。由“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农业试验所”共同负责筹备,“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教务训育等事宜。讲习会期间,由各学员提出其原校所在地关于抗战期间加紧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实际问题,并展开讨论。学员分农作组27人、园艺组15人、森林组3人,共计45人^[21]。1939年暑期,又召集其时川、滇、黔、广、陕、甘等省农工职业学校教员于重庆举办讲习会,选派省立、私立职业学校校长、主任、专任教员参加,旨在增进其关于中等农工职业教育的知识与技能^{[22]220}。同年,为培养农业中级技术人员,“农教会”还指定各公私立职业学校办理训练班,分农产制造、蚕桑、养殖三组^{[23]221}。此外,1939年,还指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办理其时陕、甘两省农事教员暑期讲习会,以便教员有进修机会^{[24]160}。这些举措一方面培养了农业师资,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在职农业教师培训,表明国民政府当局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从加强师资培训入手,达到提高农业教育质量的目的。

(五)广泛开展农业调查

“农教会”以“改进农业教育宜注重实际,革除过去徒尚形式的弊端”,决定“调查各地农民数千年来固有之良好经验,再参以现代农业科学,俾融会贯通,截长补短,以收事半功倍之效”^{[14]46}。为此,“农教会”分派农业教育专家到其时西北、西南各省实地视察指导,调查各地农民的经验,作为改革农业教育的根据。其调查范围包括农田水利、森林、作物、果树栽培、森林苗圃播种、蔬菜栽培、农产制造、通俗气候预测、农具、牲畜、牲畜病疫等11类。“农教会”还编辑《农民经验调查表》,分发其时各省市农校地开展调查,编写的调查汇编作为各级农校教材编订参考。随后,各农校在驻地展开了大规模农业调查,如,内迁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师生对其时四川的土地类型、农村经济概况、成都附近米谷生产与运销、四川农产物价以及成都市生活费用等方面开展了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对国民政府当局了解农村社会现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农业改进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与依据,也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战时农村社会提供了原始资料。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应用科学方法进行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

规模农业调查。

总之,经“农教会”推动,其时农学界在艰难探索中逐渐发展完善了多层次农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了农学学科体系,即农业教育呈现出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特征,形成了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门类广泛的农学学科体系。

三、农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国民政府农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成效

“农教会”所推行的农业教育适应了战时农业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要求,在规范推进各级农业教育、推广科学农业知识的同时,重视农业实习和试验,坚持“农、科、教”相结合的办学理念,不仅推动了战时农业教育的发展,加强了战时农业教育机关及农业团体的联络,也促进了我国近代农业学科的开拓创新与农业教育现代化进程。

(一) 农业院校及相关专业数量大幅增长

在“农教会”推动下,即便是战争年代,在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农业教育随着农业建设的推进有较大进展,各级农业学校与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从农业教育规模发展来看,其时专科以上学校农业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系科设置更为全面。全面抗战前,其时高等农业教育学校共计 17 所,其中国立院校 7 所、省立院校 7 所、私立院校 3 所。到 1942 年,共计 27 所,其中国立院校 13 所、省立院校 7 所、私立院校 7 所、农科研究所 5 所,农业专修科多个,总计学生 4 600 余人。此外,其时全国共有中等农业职业学校 130 所,学生 16,800 人^{[25]302}。农科学生人数,由 1936 年的 2 590 人增长到 1944 年的 6 042 余人,农科学生的招生占比也都稳步增长,由 6.17% 增长到 7.65%^[26]。

(二) 完善了多层次农业教育体系

“农教会”成立后,采取各项措施进一步完善了从研究生、本专科生、中专生培养到职业教育和农民教育等多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其中农科研究生的培养成效最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农科研究生的学科门类日益增加,先后成立了一批研究所,建立了一批农业推广试验站,开始了较大规模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1936 年,“中山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相续招收研究生,但招生人数甚少。全面抗战爆发后,研究生培养逐年增加,到 1945 年全国共有 6 所大学设立农科研究所、10 个学部。各农科研究所从 1938 年到 1945 年,共招收研究生 101 名,如下表所示。

表 2 1938—1945 年度全国农科研究生分单位招生统计(单位:人)^{[27]114}

学校年度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合计
私立金陵大学	1	5	6	7	15	3	9	6	52
国立中央大学			6	1			8	1	16
国立中山大学		3	1	3	2	2		1	12
国立西北农学院				3		3	2	4	12
国立浙江大学					3	4			7
国立清华大学				2					2
总计	1	8	13	16	20	12	19	12	101

“农教会”还大力推广农业职业教育。1938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设属于农业范围的水产、蚕丝、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等专修班 5 班^[21]。“农教会”还规定每区各省应添设及调整职业学校,分令各地“根据设

施原则及地方情形,分别拟具实施办法,以便循序进行”^[28]。为推进其时陕、甘、宁、青、川、康、云、贵、桂各省农业职业教育,“农教会”拟定实施计划,分其时西北、川康、西南三区办理,每区设立国立农业学院各1所或数所,负责区内农业教育技术推进指导与改进,确定区内设置高初级农业各科职业学校地点及系科。“农教会”依照各省市办理职教实况分别给予补贴^{[15]188}。

此外,“农教会”提出了不少改造农村、教育农民的建议和措施,如对农民进行科学文化教育,推广增产技术。在“农教会”的助推下,大后方出现了一些乡村教育建设试验区,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 促进了大后方农业发展与进步

战前,四川地区仅有“四川大学”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设有农业相关专业。卢沟桥事变后,随着各农业院校迁往其时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西部各地相继筹设系列农业院校。到1945年,其时四川境内的公私立农业院校多达12所。其中,设有完备农学院的大学4所,招收农科研究生的大学3所。还有部分学校设置各类农业专修科,农学专业齐全,四川由此成为其时大后方农业教育中心。详见下表。

表3 1945年四川农业专科以上学校一览^[29]

学校	校址	农学院/系	农科研究所
国立中央大学	重庆	农学院与畜牧兽医专修科	农科研究所
国立四川大学	成都	农学院	
国立复旦大学	北碚	农学院	农业专修科及研究室
私立金陵大学	成都	农学院与农业专修科	农艺学部、农业经济学部、园艺学部
私立华西协合大学	成都	农业专修科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璧山	乡村建设专修科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重庆	农业教育系	
私立川康农工学院	成都	农用化学、农林系	
私立铭贤学院	金堂	农艺、畜牧、农经系	
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	乐山	农产制造、蚕丝科	
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	乐山	养蚕科、制丝科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	巴县		

在“农教会”的推动下,这些农业院校在后方各地相继开办,客观上促进了农业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大后方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农业科研方面,师生结合各地的气候与农作物特性,广泛开展农业调查,在农作物育种、园艺、林业、蚕桑、土壤改良、畜牧养殖、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开展了多项科研活动,并取得重大进展,培育出一批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如,其时“四川大学”农学院育成了晚稻“川大洋尖”“印用麦”以及适于川省气候土壤的优良种籽苗木^[30]。“中央大学”冯泽芳、金善宝教授培育改良了棉花、小麦品种。“金陵大学”丁颖、王绥教授培育改良水稻、大豆品种。此外,师生们还改良了西南地区柑橘、龙眼、榨菜、红薯、甘蔗、烟草等主要经济作物品种,提高了这些农作物的单位产量,对战时农业增产增收做了重要贡献。

“农教会”还推动农业院校办理或合作办理农业推广事宜,深度参与当地农业生产与农村建设。如,“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在巴县新丰乡,曾举行小麦品种比较试验与推广、病虫害预防、北京鸭及来航

鸡、第一代杂交猪等畜牧推广。“中央大学”农学院、“复旦大学”垦殖专修科、“教育部社教工作团”、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合作办理乡村施教区,在松溉实验区、歌乐山乡建社等从事农业推广工作^{[31]524}。此外,农学院师生针对西部地区农业现状,因地制宜加强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如“中央大学”农科研究生对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重庆宿清棉、峨嵋植物组合及生态等问题开展研究,“金陵大学”农业研究生对南充蚕丝业、四川田赋与农地、成都蔬菜生产等问题开展研究^[32]。农业教育机构通过研究活动获取推广资料,通过教学活动培养了人才,通过推广活动使得教学、研究的成果结合,不仅直接造福于大后方农民,还促进了大后方各地农业发展,最终推动了近代农业的发展。

四、抗战时期农业教育委员会工作的局限

在“农教会”的推动下,各级农业学校与农业人才培养数量均有较大增长,农业研究机关和试验站普遍设立,在育种的改良与推广、土壤肥料的研究、蚕桑及植棉事业的推广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因为“政治制度的不良,农村经济的颓蔽,农民生活日形困苦,农业的研究就不能切实运用于农村,所以农业上的成就仍然没有什么显著”^[33]。“农教会”工作之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 农业教育与农业研究分离

由于战时农业教育制度及农业建设制度分离,农业教育机构与农业研究机构分设,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未能恰当配合。其时“国立”与“省立”农学院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农业研究机构则隶属于国民政府农林部,使教育与研究分为两部。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农林部作为管理全国农林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主要从事农作物及农村副业的试验检查保护推进,土壤肥料调查改良,种籽及农具改良推广,农事调查等相关事项^{[34]11}。这就导致“吾国数十年来之农业教育,未能与农业建设事业相配合,以致在事业上重复浪费,同区域内农业建设机关与农业学校推行之工作初无二致”^[35]。其时以章之汶为代表的多位委员曾建议,农学院应设于“中央”或“省立”大规模农事试验场附近,以实现双方人才合作,农业理论与实施相配合。但受战事影响,农业教育机构与研究机构分区域联合设置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到1946年,25个“国立”及私立农学院、9所农业专科学校及100余所“国立”及“省立”农业试验场分属于两个部门^{[36]204}。导致教育与研究分离,农学院教授所研究的问题,往往以个人兴趣而定,对农业农村实际问题关注不够。

由上可知,“农教会”着力于农业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其推动下,其时农业院校的学科专业达到了相对综合,构建了较高水平农业教育体系。但是,农业院校与农业研究机构分离,二者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存在着体制性障碍,离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研究、推广“三位一体”尚有不小距离。

(二) 重视农业学校教育,忽视对农民的职业教育

农业教育根本问题与最终目的在于增进农民的农业知识与技能,增加农民收入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从施教对象看,“农教会”推行的战时农业教育偏重于农业学校教育,注重农业专门人才培养,对于农民所急需的农业职业补习教育重视与关注不够。国民政府对战时农村的社会教育与农民教育,侧重于扫盲与识字教育。从教学内容上看,农业教学偏重于经营技术与自然科学理论的传授,而对于农村社会制度的研究与社会组织的训练则较为忽视。这可从农业院校所设系科中窥得一斑。各院校所设的系科大都属于农业自然科学,至于有关农业社会科学的系科,如农村社会、农业教育、农业推广等系科相对较少。这也导致各层次农业教育布局欠合理,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相对较快,中、初等职业教育相对较缓,农民职业教育缺乏制度化和规范化。

(三) 农业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互动不足

“农教会”成立后致力于农业院校的分区设置。1942年6月,“农教会”确定将全国划分为10个农业区域,每区各设一独立农学院,若干县设立一中等学校,各区原有农业教育机关加以改组。这表明国民政府当局已意识到应按照自然区域划分设置农业教育机关的重要性,但这一计划到抗战结束尚未实现,各级农校大多设置于通商大埠。且各级农业教育的目的与方针较为笼统,课程设置整齐划一,缺乏地域针对性教材。这些现象表明其时的农业教育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未能协调一致。只有当农业教育真正与社会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相契合,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在农业建设中大有作为,从而实现农业教育特色创新。从战时农业教育实际产生的效果看,其推广范围也仅仅局限在一些试验区及其周边区域。因此,总体上看,“农教会”推行的农业教育对战时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推动是有限的。

此外,受教育经费短缺、图书仪器设备不足、物价高涨等因素限制,使得其时学生实习工作机会少,教师们研究环境差,农业学校总量偏少,毕业生总量不多。“我国高级农业人才有限,不敷各校之分配,结果所有农业教育机关无论新旧皆有教授人才不足之感。”^{[26]302} 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农教会”工作的推进与开展。

五、结 语

作为战时国民政府农业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农教会”在颁布与制定农业教育法规、改进农业学校教育、推广农业技术、创设农业研究机构、培养农业师资、促进地方农业增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战时农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与组织保障。“农教会”的成立一改“农业部门缺乏全盘之计划”的旧况,其所推行的各项措施使农业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教育系统更加完善、农业法规更加健全,也由此保持了农业教育的延续性,创造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新篇章。“农教会”与各级农业院校在大后方极力发展农业教育事业,是大后方农业教育与农业推广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改变了战前西部地区农业落后的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农教会”推行的农业教育政策与措施虽促进了农业教育的发展,但受动荡时局影响,各项工作亦存在不足之处。如,“农教会”所推行的各项工作,缺乏长效制度、法规保障,带有实用性、功利性和不彻底性,由此亦决定了其对农业教育政策缺乏长远规划和统筹布局。至抗战后期,大后方农村各种关系进一步恶化,农业发展呈现出衰退趋势。

总之,“农教会”创立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是国难时局下,知识精英推行“教育救国”“农业救国”的产物。其宗旨为“改革传统中国最主要的发展力量乡村,通过教育聚集民族力量”^[37],其主要工作与抗战增产增收紧密结合,通过大力发展农业教育,推广农业知识。总结这一段历史对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38]均有一定借鉴与启发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周邦任. 费旭.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4.
- [2] 杨士谋. 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略[M]. 北京: 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4.
- [3] 包平. 二十世纪中国农业教育变迁研究[M].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7.
- [4] 李瑛. 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 [5] 陈植. 抗战时期调整农业教育之管见[J], 中央周刊, 1938(19):4-8.
- [6] 莫定森. 战时农业与农业教育[J]. 英大周刊, 1940(09):1-2.
- [7] 教育部制订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1938年)[M].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8] 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章程[J]. 教育通讯, 1938(15):11-13.
- [9] 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举行会议[J]. 教育通讯, 1938(22):9.
- [10] 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J]. 教与学, 1938(08):58.
- [11] 朱家骅. 第二次教育年鉴(第四册)[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 [12] (修正)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章程[J]. 中华农学会通讯, 1942(21):5-6.
- [13] 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过去工作概见[J]. 中华农学会通讯, 1942(21):12.
- [14] 教育部. 一年来教育部重要工作概况[M]. 内部印刷. 1939.
- [15] 中国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行政教育工作报告(1940年7月)[G].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革命文献第58辑抗战时期教育. 台北:兴台印刷厂, 1972.
- [16] 章之汶, 郭敏学. 三十年来之中国农业教育[J]. 学思, 1943(12):1-10.
- [17] 钟道赞. 抗战十年来中国职业教育[J]. 中华教育界, 1947(01):90.
- [18]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国民参政会第二期集会政府教育报告[G].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类编教育卷第656册.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 [19] 中国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行政院教育部工作报告(1941年12月)[G].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革命文献第58辑抗战时期教育. 台北:兴台印刷厂. 1972.
- [20] 白桃. 抗战三年来之中国教育[J]. 中苏文化杂志, 1940(抗战2周年纪念特刊):189-198.
- [21] 萧显铭. 参加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农业职业学校教员暑期讲习会杂记[J]. 云南教育通讯, 1939(25-27):12.
- [22] 二十八年农业职业学校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1939年7月15日)[G]. 教育法令汇编第五辑, 内部刊行. 1940.
- [23] 教育部二十八年度年举办各项短期职业训练班办法(1939年8月21日)[G]. 教育法令汇编第五辑, 内部刊行. 1940.
- [24] 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教育报告(1939年1月至10月止)[M]. 革命文献第五十八辑抗战时期教育.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台北:兴台印刷厂, 1972.
- [25] 邹秉文. 关于1942年后方农业建设稿(1943年7月)[G].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26] 欧元怀. 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J]. 中华教育界, 1947(01):7-39.
- [27] 董维春. 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G]. 郑小波主编. “三农”教育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 [28] 边理庭. 抗战以来我国中等教育的实况[J]. 教育杂志, 1939(07):19.
- [29] 四川各大学及专科学校一览[J]. 川康建设, 1945(01):63-65.
- [30] 彭家元. 农业教育与川大农学院[J]. 国立四川大学校刊, 1944(02):2.
- [31] 高显鉴.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推进社教工作报告[G]. 张建中, 等.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教育.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32] 三年来教育部通过之硕士论文[J]. 教育通讯, 1946(05):12.
- [33] 北碚分社. 略论抗战八年来的中国科学界[J]. 科学时代, 1946(04):2-5.
- [34] 农林组织法(1940年5月1日)[G].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35] 郭敏学. 当前之农业教育问题[J]. 乡政, 1946(01):30-32.
- [36]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47.

- [37] 朱桂琴,胡琪.从陶行知“教育救国”到新时代教育强国:教育的时代使命与担当[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4):28-35.
- [38] 罗玲.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实验教育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5):42-49.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Educ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Rear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uo L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Committee in 1938 as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bod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was also an important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plan and guid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wartime system and the long-term war of resistance, th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Committee made an overall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fo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control areas. Although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Committee has a clear official position, with practicability, utilitarian and non-thoroughness,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China's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wartime, advancing agricultural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knowledge. Therefore,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both on th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wartime rear area's agricultural education not only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but also has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exi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committee of national government; rear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刘力]